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的国际舆论研究*

宋舒扬 周玉顺

[摘要] 1979年至1981年,由于中国经济调整造成对外开放步伐放缓,国际上曾出现过两次规模较大的舆论热潮,直接关系到中国经济发展与对外合作的走向。中国共产党及时关注和回应国际舆论,使舆论风向从“大引进”时期的盲目乐观,转向更加理智冷静地看待中国发展与对外开放前景;从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杆评价中国问题,到认可中国式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国际舆论的发展演变显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起步,不仅是中国对内对外政策变化的过程,更是中外双方不断消除误解和达成共识,解除怀疑和塑造信任,减少盲目预期和构建理性认知的磨合和试错历程。

[关键词] 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国际舆论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708(2024)01-0042-12

中国对外开放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不断在摸索中调整和前进。1979年至1981年,由于起步阶段急躁冒进的情绪,中国经济发展遭遇曲折,不得不由“改革”为重心向“调整”为重心转变。这引起了外媒对中国现代化道路是否会后退的担忧,在国际上掀起了舆论热潮。目前,学界对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的探讨,主要侧重于对历史进程、主要人物思想、调整与改革的关系及具体政策的研究,对经济调整造成的国际影响关注较少^①。作为中央授权独家转载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媒体报道的报纸,《参考消息》较为客观地呈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前后国际舆论的转变过程,为探讨国际社会对中国改革与调整的认知提供了重要参考材料。本文基于《参考消息》的国际报道,辅之以《参考资料》《经济研究参考资料》《对外报道参考》等史料,以及《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等外文报刊资料,对经济调整的国际舆论评价及转变经过进行梳理,进而探究改革开放初期中外在磨合和试错中构建共识的复杂历程。

一、经济调整引发的国际舆论热潮

中国向改革开放迈进的20世纪70年代,正处于世界经济形势的转折期^②。受“美元冲击”和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百年中共党报党刊史(多卷本)”(20&ZD325)的阶段性成果。

① 关于改革开放初期经济调整的研究成果参见王春红、马洪军:《80年代初陈云关于经济调整的思想》,《理论学刊》1996年第5期;黄如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经济冒进与经济调整》,《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6期;肖冬连:《1979年国民经济调整方针的提出与争论——大转折纪事之一》,《党史博览》2004年第10期;陈雪薇:《陈云与20世纪80年代初期国民经济的调整》,《党的文献》2005年第4期;刘荣刚:《对一九七八年二十二个成套设备项目引进的历史回顾》,《中共党史研究》2005年第5期;朱玉:《李先念与一九七九年的经济调整工作》,《中共党史研究》2006年第1期;史义军:《1979年:国民经济在争论中实施调整》,《党史博览》2008年第7期;朱佳木:《改革开放初期的陈云与邓小平》,《当代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3期;萧冬连:《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一年的经济调整研究》,《中共党史研究》2015年第9期;于革、孟宪生:《邓小平关于调整国民经济关系的思想探析》,《经济纵横》2018年第9期;肖晔宸、张克非:《平衡、协调与奠基:1979—1984年经济调整探析》,《江西财经大学学报》2021年第1期;牛建立:《陈云与改革开放初期的国民经济调整》,《党的文献》2022年第5期等。

② 《美利坚文谈世界经济形势:〈一场新的经济竞赛〉》,《参考消息》1979年5月29日,第2版。

“石油冲击”的影响^①，西方国家普遍面临国内外市场萎缩，产品、技术、资本过剩的问题^②。中国潜力巨大的市场、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石油等能源储备对其有极大的吸引力，“发达国家的机械制造商们，为了给过剩资本寻找‘销路’，正在窥伺中国市场”^③。由于这种特殊的国际环境，各国新闻媒体“极为关心地密切注视中国出现的各种新趋向”^④。中国向外界传达出扩大引进的政策信号后，各国反响强烈，“出现了可以称为‘中国热’的情况”^⑤。日本、美国和欧洲各国纷纷与中国签订协议和出口成套设备，形成了抢占中国新市场的“竞赛”^⑥，甚至由“竞走”逐渐演变为“跑步”“冲刺”^⑦。在这一时期激烈的竞争态势下，西方发达国家陶醉于“中国热”之中，对中国的贸易潜力和资金需求缺乏冷静理智的分析，存在盲目乐观的情绪。

在乐观之余，外媒也认识到，中国实现现代化仍面临层层障碍。日本媒体指出，中国还面临着技术人员青黄不接、获得大量外汇困难等诸多问题^⑧。英国《金融时报》指出，实现现代化不是签订数十项电站或者采矿机械的合同，然后坐等这些设备运来这样一个简单的问题，做得过头了就会导致拥挤和浪费，中国发展目标的实现还有待观察^⑨。法新社也提醒人们“应该慎防过分乐观的情绪”，“确实有很多机会，但是对中国人不能操之过急”^⑩。尽管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方针的可行性仍在观望，但总体上，这一时期国际舆论对中国发展前景的估计是十分乐观的。

国际上对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担忧并非完全多余。“文革”结束后，由于急于恢复和发展被耽误的国民经济，加之“左”的错误思想尚未完全清除，中国在制定十年经济规划和实施“大引进”时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况。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讨论通过的《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到1985年粮食生产要达8000亿斤、钢铁产量达6000万吨、原油达2.5亿吨，在2000年以前全面实现四个现代化^⑪。面对这个宏大的目标，有外媒质疑中国的十年规划“不是有点过于膨胀了吗？”^⑫香港《东方地平线》英文月刊表示，“中国为自己规定的任务，起码可以说是十分艰巨的”，“中国计划人员面临的几乎使人无法想象”^⑬。日本《每日新闻》认为，“中国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是极其大胆的”，“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决不是轻而易举的”^⑭。美国中央情报局分析，由于经济上、社会上和思想上的障碍，“中国可能需要比到一九八五年截止的更长的时间才能达到它目前规定的现代化目标”^⑮。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报告《毛以后的中国经济》，也对中国能否实现计划目标表示怀疑^⑯。

① 「経済大変動崩れた“土台”ドルと石油 70年代の検証 21世紀への接近」、『朝日新聞』1979年12月12日朝刊、1頁。

② 萧冬连：《关于改革开放起步时期国际环境的考察》，《中共党史研究》2022年第4期。

③ 《日刊刊登力石定一教授的文章〈中国应引进“中间技术”来实现现代化〉》，《参考消息》1979年3月30日，第1版。

④ 《瑞士一部长说欧洲应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参考消息》1978年11月27日，第1版。

⑤ 《日本〈读卖新闻〉报道：〈产业界的“中国热”，通过邓小平访日将达最高潮〉》，《参考消息》1978年10月18日，第3版。

⑥ Hobart Rowen. “China Pushes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Through Deals With Capitalist Nations”. *The Washington Post*, 19 Nov 1978, p. K1.

⑦ 《香港〈快报〉载文评英美对我贸易的步伐：〈竞走 跑步 冲刺〉》，《参考消息》1978年11月18日，第4版。

⑧ 《日报评论：〈中国十年规划，大胆的高速增长路线〉》，《参考消息》1978年3月10日，第4版。

⑨ 《英〈金融时报〉署名文章：〈修改通往在经济上取得成功的道路〉》，《参考消息》1978年2月26日，第4版。

⑩ 《西德银行家霍伊斯根在香港谈话观感》，《参考消息》1978年10月8日，第4版。

⑪ 郑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77—1991）》，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19页。

⑫ 《日报报道〈日本观测：中国“十年规划”可能缩小〉》，《参考消息》1979年3月22日，第4版。

⑬ 《香港〈东方地平线〉月刊文章：〈中国奔向二十一世纪〉》，《参考消息》1978年7月26日，第4版。

⑭ 《日报评论：〈中国十年规划，大胆的高速增长路线〉》，《参考消息》1978年3月10日，第4版。

⑮ 《美国中央情报局谈我经济情况》，《参考消息》1979年3月23日，第4版。

⑯ 《英报谈美国国会联合经委会出版一本关于我国经济情况的书〈周恩来的总计划得到恢复〉》，《参考消息》1978年12月5日，第4版。

与十年经济规划相对应的是对外的“大引进”政策。1978年,中国共签署78亿美元的引进合同,大部分以现汇支付,引进项目所需国内投资1300亿人民币,外汇和国内配套投资缺口都很大^①。到了1978年底,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东北组发言上强调,引进项目要循序渐进,不要一拥而上,相当于正式向中央提出经济要调整的意见^②。这些意见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也有所体现,日本《朝日新闻》注意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强调基本建设必须循序渐进,“不可一拥而上,造成窝工和浪费”,加之负责经济的干部调动,种种迹象表明,中国要“重新制定考虑具有更好的投资效果的建设计划”^③。

外媒真正开始大规模关注中国经济调整的动向,是从部分中外经济合同被冻结开始的,并由此引发了第一波国际舆论热潮。1979年初,中央开始着手研究调整1979年的经济计划^④,考虑“减少一些钢铁厂和一些大项目”^⑤。一些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企业收到了保留履行合同的通知书,这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反响。由于中国的经济调整方针尚未对外公布,围绕着中国方面的真实意图,一时传出了各种各样的猜测,也引起了某些不安。彼时正值对越自卫反击战时期,有媒体猜测中国的政策变动是受到中越争端的影响;有媒体猜测这是要改变“四个现代化”路线^⑥;还有的媒体根据《人民日报》《红旗》刊发的文章推测“中国内部,正围绕着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将对哪些领域进行重点投资的问题作某种程度的轨道修正”^⑦。面对国际舆论的种种猜疑,3月4日,李先念在会见乡恒淳为团长、釜井卓三为秘书长的日本《读卖新闻》访华团时作出了回应^⑧,他否认了改变经济计划同对越自卫反击战有关的谣传,并对经济调整做了初步说明:“有些同志,包括我自己,认为我们太性急了。我们正在考虑是不是应该把到一九八五年生产六千万吨钢的指标降低一些”^⑨。根据这些信息,外媒判断中国修改和调整经济计划的动向“可能发展到对成为中国‘四个现代化’路线的支柱的中国国民经济发展十年规划本身要作全面地重新估量”^⑩。

中国经济政策的突然调整,使国际上盲目乐观的情绪开始消退,“一度气势磅礴的中国热,最近好象也有点冷下来了”^⑪。法国《回声报》表示,“中国奔向现代化的赛跑达到了这样的高速度,以致于不再有任何人认真考虑它会向后倒退”,今后外国投资者不得不思考可能产生的后果^⑫。美国《幸福》月刊指出:“初期的那种狂热劲头开始消失,许多美国实业家逐渐认识到,要挤进中国向西方开放的狭窄的门廊比他们原来预料的困难得多”^⑬。路透社也说:“中国的门户开放经济政策使人们产生最初的欣快心情正在逐渐消退,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公司和银行也渐渐认识到,通往北京之路,非但不是用黄金铺的,而且可能荆棘丛生。”急于从中国牟利的外国人开始意识到,同中国的贸易往来和资金协议“不会是无限制的发财机会”,对中外经济合作交流

① 萧冬连:《探路之役:1978—1992年的中国经济改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63~64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8~229页。

③ 《法报文章〈中国打算降低它的经济目标〉》,《参考消息》1979年3月12日,第4版。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第233页。

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466页。

⑥ 《日报报道〈日本观测:中国“十年规划”可能缩小〉》,《参考消息》1979年3月22日,第4版。

⑦ 「经济建设で軌道修正? 通産・外務省が分析効率考へ新計画も」,『朝日新聞』1979年3月1日朝刊、9頁。

⑧ 《李先念传》编写组、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李先念年谱(1979—1992年)》第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7页。

⑨ 《美报报道〈中国放慢同西方公司谈判的速度〉》,《参考消息》1979年3月22日,第4版。

⑩ 《日报报道〈日本观测:中国“十年规划”可能缩小〉》,《参考消息》1979年3月22日,第4版。

⑪ 《日〈时事解说〉短评〈冷下来的中国热〉》,《参考消息》1979年4月28日,第1版。

⑫ 《法报文章〈中国打算降低它的经济目标〉》,《参考消息》1979年3月12日,第4版。

⑬ 《美国〈幸福〉月刊文章:〈中国向西方开放的窄门〉(上)》,《参考消息》1979年5月20日,第4版。

必须持谨慎态度^①。

冷静下来后，国际舆论开始以更加理智的态度反思各国在中国的经济失衡中所承担的责任。英商凯瑟克表示，自从中国宣布现代化计划以来，“在西方，在欧洲，在日本，当然也有美国，对中国存在着一种不是从实际出发的过分乐观的看法”^②。日本媒体也认为应当自我反省，“我国经济界过去仅仅注意到目标数字的巨大，过分陶醉于‘中国热’之中”，“但是无视中国方面的支付能力是不可能付诸实现的”^③，“‘十亿人口的市场’，的确有诱惑力，但是不看对方的国情急着打进去，这是不会持久的”^④。中国的经济调整使各国重新感到，有必要踏踏实实地对中国经济进行考量，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中国在走向何处^⑤。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了对整个国民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⑥。5月14日，国务院下达了调整后的年度国民经济计划。次月召开的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宣布，集中三年的时间，把国民经济逐步纳入持久的按比例的高速度发展的轨道^⑦。对外媒而言，“中国经济经过几个月的捉摸不定的局面之后，新的方针终于逐步明确了”^⑧。方针政策的明晰消除了猜忌，国际舆论也开始转向积极，纷纷评论经济调整是“一个思考间歇”“健康的现象”“形成更稳定的经济关系的良机”“冷静的现实主义”“绝对必要的”“明智之举”“稳妥和清醒的现实主义的胜利”。外媒普遍认为，中国的经济调整建立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而非建立在盲目乐观的基础上，这对中外双方都是有利的^⑨，表面上来看似乎是后退了一步，实际上是站稳了一步^⑩。加拿大《环球邮报》指出，经济调整并不意味着中国试图关上刚刚向世界贸易国打开的大门，新的谨慎情绪反而有利于避免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犯过的错误^⑪。总的来说，“在中国和工业化国家的新关系中出现的这个初次风波，尚未使诸如国际金融界人士这些潜在的投资者失望”^⑫。

第二次国际舆论热潮发生在1980年底。由于调整方针执行不理想，中央决定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宝钢一期工程缓建，二期工程停建，22个重大引进项目部分被推迟或撤销。这在国际上引起了很大反应，“一些国家对此产生了疑虑和不理解，甚至对中国现代化计划发生了怀疑，认为中国是在后退，是在走下坡路”^⑬。1980年11月21日，谷牧会见以濑川美能留为团长的日本野村集团访华团^⑭，表示将推迟上海宝山钢铁厂工程，导致日本舆论界出现哗然之声。《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上海宝山钢铁厂可以被称为中日经济合作的“象征”。中国国务院突然作出的这项决定，不仅会给以新日本钢铁公司为中心的日本相关企业造成巨大冲击，也将在国际上掀起

① 《路透社记者评我对外贸易情况》，《参考消息》1979年3月13日，第4版。

② 《英商凯瑟克在东京谈中国情况》，《参考消息》1979年4月14日，第4版。

③ 《日本报纸就延长日中贸易协议发表评论》，《参考消息》1979年4月3日，第1版。

④ 《日报社论：〈中国的经济调整和日中关系〉》，《参考消息》1979年5月28日，第4版。

⑤ 《美报报道〈中国放慢同西方公司谈判的速度〉》，《参考消息》1979年3月22日，第4版。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下卷，第243页。

⑦ 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一九七九年六月十八日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第2版。

⑧ 《路透社说：中国经济新方针逐步明确了》，《参考消息》1979年5月28日，第4版。

⑨ John Glenn. "China's limited influence". The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30 Aug 1979, p. 23.

⑩ 《港报文章〈中共修正了经济发展的计划〉》，《参考消息》1979年7月8日，第4版。

⑪ 《加拿大〈环球邮报〉刊登文迪·克尔的文章：中国认识到必须先奠定工业化基础》，《参考消息》1979年5月14日。

⑫ 《法报文章〈中国打算降低它的经济目标〉》，《参考消息》1979年3月12日，第4版。

⑬ 温伯友：《一次成功的讨论会——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侧记》，《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第21页。

⑭ 《谷牧会见日本野村集团访华团》，《人民日报》1980年11月22日，第4版。

波澜^①，对两国经济关系造成巨大影响^②。

1980年12月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全面实行和坚决贯彻调整方针》的长篇社论，表示完成经济调整的任务需要更多的时间，对那些投资多、建设周期长、条件不完全具备的项目，要采取“唯实”的态度，坚决加以调整^③。日本媒体认为，该社论标志着中国经济政策的重大转变，中国今后的经济政策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突出调整^④。次年1月13日，中国外交部向驻北京外国记者团说明中国经济前景时，公布了姚依林关于上海宝钢第二期工程的讲话。共同社分析这一举动“正式表明中国将停止宝山第二期工程”^⑤。日本《每日新闻》认为该讲话“实际就是放弃高速增长政策的宣言”，“是否会发生摩擦，今后的发展方向值得注意”^⑥。《纽约时报》也担心“新政策有可能破坏中国与外国投资者之间已经紧张的关系”^⑦。中国的经济调整关系到中外经济合作的未来航向，一时成为国际舆论的焦点，外媒的评价也日趋复杂多元。

二、国际舆论对经济调整的多元认知

在改革开放的起步阶段，国际舆论高度关注中国经济贸易政策和经济发展趋势。1979年下半年，经济调整政策实施后，国际媒体对中国经济形势的报道重点发生了明显转移：第一，由着重评价经济改革，转向探讨经济调整得失；第二，由过去一直赞扬经济改革，转向对经济调整持几种不一致的看法；第三，从注意经济改革的近期效果，转向研讨今后的长期发展^⑧。外媒对经济调整的反应十分强烈。据统计，《参考消息》关于国民经济调整的相关报道，在1979年有80篇，在1980年有45篇，1981年国际舆论达到高潮时，单年报道数达132篇。在报道来源方面，日本相关报道共129篇，美国报道有64篇，足见西方发达国家媒体对中国经济调整关注之密切。一方面，国际舆论想了解中外合作工程会不会被迫“下马”；另一方面，则是想观察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会不会后退，这两点都与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利益直接相关。

中国实施经济调整后，国际舆论曾一度出现悲观的情绪，甚至出现了“经济改革失败”的论调，特别是日本舆论界反应最为激烈。1979年底，共同社、《东京新闻》、《朝日新闻》等媒体的宣传调子是：中国目前面临能源不足、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三重困难，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远比预料的糟糕，经济政策的失败要比预想的惨重得多。进入1981年后，日本舆论情绪进一步由担心变为不满。得悉中国决心调整一些中日合作项目后，日本几家主要媒体连续半个多月，在报纸头版发表一系列评论、社论，渲染中国经济出现严重问题，声称日本企业将“蒙受巨大损失”，“日中长期贸易协议的基础已经崩溃”等等^⑨。还有日本报纸要求中国进行赔偿，甚至激进地表示要

① 「中国政府、宝山製鉄所第2期工事の延期を決定、化繊プラント建設も——副首相語る」、『日本経済新聞』1980年11月24日朝刊、1頁。

② 「宝山製鉄所第2期工事の延期、経済調整の深刻さを象徴——産業界の対中不満拡大」、『日本経済新聞』1980年11月24日朝刊、7頁。

③ 《全面实行和坚决贯彻调整方针》，《人民日报》1980年12月2日，第1版。

④ 「中国、基本建設厳しく抑制、地方の権限を縮小——人民日報社説」、『日本経済新聞』1980年12月3日朝刊、4頁。

⑤ 《共同社報道：〈中国停止宝钢第二期工程〉》，《参考消息》1981年1月21日，第2版。

⑥ 《日报评姚依林和万里十三日讲话》，《参考消息》1981年2月2日，第2版。

⑦ James P. Sterba. "China Steel Project Is Postponed: China Steel Project Off". *The New York Times*, 02 Feb 1981, p. D1.

⑧ 《国外舆论谈中国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1期。

⑨ 《国外舆论谈中国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1期。

向国际出口信贷组织动议制裁中国^①。《纽约时报》报道，日方“被中国明显搁置的越来越多的大型项目所刺痛，现在开始质疑两国经济关系的未来”^②。

日本政府人员对这种舆论态势表示担忧：“由于建设中止而向日本企业赔偿，是民间的问题，可是，这样的事情如果继续下去，就会引起日中两国的彼此不信任，给整个日中关系带来影响。”因此，决定由日本政府出面解决问题^③。当时日本政府内部，内阁成员对中国经济未来看法各异，有人比较乐观，有人表示悲观。渡边藏相表示“并不乐观”“也不需要悲观”^④，田中通产相表示“丝毫不感到失望，而是存有担心”^⑤。日本政府基于对中日关系的长远考虑，态度总体比较谨慎。铃木首相在接受众议院的质询时表示：“日中关系必须搞成安定的关系，而不可以是过去那样冲动的关系……日中关系要用长远的眼光发展下去”^⑥。

1981年2月，日本政府代表大来佐武郎就中日经济合作问题来华交涉，中国承诺根据国际惯例进行赔偿^⑦。大来佐武郎访华后，一些日媒的态度开始转变，犀利的论调有所缓和。针对中国方面提出的资金合作的要求，日本政界和产业界开始兴起“资金合作论”，主张由日本提供贷款资金协助完成计划项目^⑧。8月7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宝钢续建^⑨。后经协商，日方决定提供3000亿日元的新贷款用于宝钢一期工程和大庆石化工程的建设，以继续执行与日方相关企业的进口合同^⑩。至此，坚冰已经打破，日本舆论也逐渐转向温和。但是，一些媒体对中国经济困难和自身经济损失的夸大宣传，已在国际上造成了较为恶劣的影响。比如，《东京新闻》宣扬：“最重信义的中国放弃了经济上的信义，因此日本对整个中国的不信任感加深了。”^⑪这些言论，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际信誉。

相比之下，美国、西欧等其他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华贸易受到的影响可能不像日本那么严重”^⑫，因而对中国的经济调整做出了相对客观的评价。一方面，西方开始以更加现实的态度考量曾经对中国市场出现的乐观情绪^⑬，另一方面，他们仍对中外经济合作的长期前景持谨慎的乐观态度。《纽约时报》认为，部分中国项目被取消，预计会挫伤一些美国公司的热情，但“影响是有限的”^⑭。美驻上海总领事唐纳德·安德森表示，中国的调整方针在短期内会对对外贸易产生消极影响，但“中国进行经济调整是正确的决定”^⑮。西德《科隆城新闻报》也指出，中国经济调整将为中外经济合作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一个大市场将逐渐向世界贸易开

① 《港报文章〈大来在港谈中日合同问题〉》，《参考消息》1981年5月11日，第2版。

② Henry Scott Stokes. “Japanese Reassess China Plans”. *The New York Times*, 16 Feb 1981, p. D1.

③ 《铃木和田中就中日经济关系问题在众院答询》，《参考消息》1981年2月10日，第2版。

④ 《日本藏相渡边在答记者问时说：中国经济调整政策是可行的》，《参考消息》1980年12月10日，第2版。

⑤ 《外电报道邓小平同日本内阁大臣谈话内容》，《参考消息》1980年12月6日，第1版。

⑥ 《铃木和田中就中日经济关系问题在众院答询》，《参考消息》1981年2月10日，第2版。

⑦ 《大来举行记者招待会谈同邓小平会谈情况》，《参考消息》1981年2月14日，第1版。

⑧ 「中国のプラント破棄問題、政界・産業界で資金協力の声高まる——日中間のギ裂懸念」、『日本経済新聞』1981年2月24日朝刊、4頁。

⑨ 《宝钢志》编纂委员会：《宝钢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2页。

⑩ 《日决定向我提供三千亿日元贷款》，《参考消息》1981年12月14日，第2版。

⑪ 《国外舆论谈中国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1期。

⑫ Fox Butterfield. “Skepticism Over China Trade”. *The New York Times*, 08 Feb 1981, p. IES44.

⑬ “U.S. Hope Tempered on Trade With China: Peking Seeks To Balance Its Import Needs”. *The New York Times*, 29 Dec 1980, p. D3.

⑭ Fox Butterfield. “New Wariness Over China Deals”. *The New York Times*, 01 Oct 1980, p. D1.

⑮ 《美驻上海总领事说：中国进行经济调整是正确的决定》，《参考消息》1981年2月28日，第1版。

放”^①。概言之，他们认为尽管中国经济计划有所削减，但中国仍然致力于开放政策^②，“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前景并没有暗淡”^③。泰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巴西等第三世界国家的媒体对中国经济调整的态度也较为温和。

相较之下，苏联等国家则趁机挑拨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之间的关系，散播中国政治经济形势不稳的谣言。中国决定推迟宝钢工程后，塔斯社挑拨中日经济合作关系，报道称，日本实业界“又一次直接得到了中国这个贸易伙伴并不可靠的教训”，日本应该从与中国的合作中吸取教训^④。在中欧经济合作关系方面，塔斯社夸大了经济调整后，“西欧对同北京的贸易经济联系的悲观态度和越来越失望的情绪”^⑤。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时，中国的经济调整已初见成效，许多外国记者对中国经济成就进行了突出报道，苏联塔斯社却继续播发反华评论，“重弹中国不稳的调调”^⑥。这种霸权主义支配下的舆论评价并非基于中国发展的实际，而是以外交关系和意识形态为标准，以攻击、指责和污蔑为基本形式，显然缺乏客观性和公正性。

这一时期，外媒围绕中国经济调整探讨的问题很多，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两个核心议题。

首先，经济调整是否是必要的。有外媒质疑中国经济调整过于匆忙，部分调整是没有必要的。比如，日本《每日新闻》表示，中国的经济计划是极不周全的，政策转变也过分性急，缺少成熟的考虑，“是一种不周密、非经济性的削减建设投资的倾向”，“做出停止宝山钢厂第二期工程的决定，作为一项经济政策，是否真有必要，令人十分怀疑”^⑦。但大部分国际舆论承认经济调整的必要性。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经济系主任薛天栋指出，中国之前经济规划中确实存在“左”的错误：“从常识来判断，很可能是快了一点，在打倒四人帮后，中国现在已经是一种新的形态，但有一大部分人的想法也许还未能适应过来”^⑧。香港企业家罗兰士·嘉道理也认为：“中国现代化的最大障碍在于一个危险，就是企图在太短的时间内做太多的事。”^⑨日本《时事解说》杂志指出，“中国的现代化计划是一切都要同时发展的倾向过分强烈了，并且现代化的速度也有点过分快了”，中国需要的是与实力相适应的现代化计划，应该进行一番踏踏实实的重新估计^⑩。还有外媒强调，经济调整是国家经济发展的正常现象，“新体制由于对四个现代化热情过高，从而用力过猛，出了线。不论哪个国家都有这种经验，并不稀奇”，“值得注目的是中国老老实实地承认事实，大胆地着手修正这种灵活的态度”^⑪。正如邓小平会见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时所指出：“许多美国经济学家、外国专家们，都认为我们的经济调整工作是必要的。调整要稳，时间不妨长一点，步调不妨慢一点。欲速则不达嘛。”^⑫

其次，经济调整是“后退”还是“前进”。国际上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调整标志着经济改革的停滞，是一种“后退”，并对中国的发展前景表示担忧。比如，日本《经济学人》周刊指出，从

① 《西德报纸评我经济调整》，《参考消息》1981年1月31日，第2版。

② Reuters. “David Rockefeller, in China, Says Peking Retains Open-Door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24 May 1981, p. A7.

③ Hobart Rowen. “China Bites Bullet, Sees Past Errors In Planning Its Economy: China Looking Again at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The Washington Post*, 22 Feb 1981, p. G1-G8.

④ 《塔斯社就我推迟宝钢第二期工程挑拨中日关系》，《参考消息》1980年12月1日，第2版。

⑤ 《塔斯社宣传：‘共同体——中国贸易周’‘毫无结果’》，《参考消息》1981年4月27日，第2版。

⑥ 《各方舆论对中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评论综述》，《参考消息》1981年12月11日，第1版。

⑦ 《日〈每日新闻〉评我经济调整〈性急的政策转变〉》，《参考消息》1981年1月29日，第2版。

⑧ 《中国搞现代化所要注意的问题〈待续〉》，《参考消息》1979年3月31日，第1版。

⑨ 《香港企业家嘉道理谈中国四化问题》，《参考消息》1980年7月26日，第2版。

⑩ 《日〈时事解说〉短评〈冷下来的中国热〉》，《参考消息》1979年4月28日，第1版。

⑪ 《日本报纸就延长日中贸易协议发表评论》，《参考消息》1979年4月3日，第1版。

⑫ 《香港〈明报〉社社长查良镛报道：〈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谈话纪录〉（上）》，《参考消息》1981年8月29日，第1版。

“大跃进”到“文革”，中国的经济计划经历了非常激烈的动荡，“现在的现代化路线没有摇摆了吗？现在的变化是趋向呢，还是周期？因为转变太快，有人担心会产生相反运动，这也是理所当然的”^①。合众国际社也表示：“这种新政策究竟是向计划工作全部中央集权倒退的步骤呢，还是从市场社会主义暂时后退，西方分析家的看法有分歧”^②。面对这种质疑，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参议院代表团时指出：“发热的头脑已经冷静了下来，这是后退呢？还是前进呢？我认为是前进”^③。国际舆论的主流观点也认为，经济调整恰恰防止了“后退”，是稳步前进的标志。香港《中报》认为，国民经济调整不是后退，也不是起飞，而是稳当地一步一步地前进，“稳比较好，虽然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可能慢一点，却免掉了‘大跃进’带来‘大跃退’的恐惧”^④。日本一桥大学教授石川滋表示，“今天中国所发生的困难，是转变中的困难，这与因政策失败、自然灾害和国际问题而引起的困难与混乱不同”，“中国采取调整政策，从长期来看，其本身就是光明的，是新的结构性转变的光明因素”^⑤。巴西《圣保罗州报》指出，中国发展速度比较缓慢，但是始终在前进，“这同不负责任的狂热年代的情况正好相反”“那时候，向前跨一步，马上又向后退两步”^⑥。国际舆论总体认为，中国的经济调整是积极和必要的。但是一直持续到1981年，国际上仍存在着较为激烈的争论。

三、中外舆论互动与国际舆论的转向

中共密切关注国际上对经济调整的质疑和争论，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对外宣传策略，积极主动做出回应，从而构成了中外舆论动态的双向互动，在较短的时间内推动了国际舆论的积极转向。

第二次经济调整掀起舆论高潮后，中央专门对国际舆情进行了调研和分析。《对外报道参考》专门刊发关于外国舆论界对中国经济调整反应的综述性文章，总结了国际关心和探讨的主要问题：“中国经济调整是全线撤退，还是有进有退？”“中国经济调整是搞积极平衡，还是消极平衡？”“中国经济形势是骑虎难下，还是形势大好？”“中国经济调整是治标还是治本”“中国经济退够的标志之一是不是允许搞一点资本主义？”“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经济前途究竟是否乐观？根据何在？”等等^⑦。1981年5月，新华社副社长李普在对外记者会议上指出，“国外对我国很不理解，议论纷纷，问题很多”，有几个方面都与经济调整相关：经济调整是不是表明中国的经济崩溃了；中国是不是不搞社会主义，而搞资本主义了；同中国到底有没有生意可做，等等。李普强调，国外资本家有这样的怀疑是不会轻易到中国投资的，“所以，我们应当针对这些问题进行报道”^⑧。在调研的基础上，中共高度重视对外宣传工作，有针对性地对国际上的疑惑进行解释和引导，“在报道经济调整的同时，适当报道经济调整

① 《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理事长金森久雄撰文说：中国经济潜藏着高速发展的能力》，《参考消息》1979年4月20日，第1版。

② 《合众国际社记者评中国经济调整》，《参考消息》1981年2月25日，第2版。

③ 《共同社报道邓小平会见日本参院代表团的谈话》，《参考消息》1981年1月14日，第1版。

④ 《香港〈中报〉说：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地前进》，《参考消息》1981年12月4日，第1版。

⑤ 《日本教授石川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参考消息》1981年7月23日，第2版。

⑥ 《巴西报纸文章〈中国调整现代化步伐〉》，《参考消息》1982年1月31日，第2版。

⑦ 《国外舆论谈中国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1期。

⑧ 《加强针对性，开拓新局面》，《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4期。

与改革的关系,改革的情况以及效果”^①,从而使国外读者能够较全面地知悉中国的经济面貌。

为了消除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政策的误解和担忧,中共积极把握合适时机向国际澄清,中国仍在对外贸易和经济合作中坚持“门户开放”的政策^②。1981年3月23日至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联合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在杭州举办了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24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学家、银行家和企业家参会。会上有部分外国人不清楚中国的经济调整方针,有人认为大规模压缩基本建设投资是轻率和缺乏远见的表现,有人认为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失败了,要回到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老路上去,还有人担心中国缺少外商投资的良好环境条件^③。中国代表通过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及个别交谈等方式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释。特别是薛暮桥、季崇威、卜明等人的发言,使外国代表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经济调整政策,取得了良好效果。讨论会美方秘书长韦尔登·吉布森说:“中国的经济调整和现代化计划比西方国家看得更远。”美国《幸福》杂志主编威廉·鲁凯泽表示,“调整是明智之举”,“你们国家经过了多年痛苦之后,现在将智慧用于解决实际问题,按照成功的经验,来制定战略,中国是非常有希望的”^④。

随着对外宣传工作的深入开展,以及中国经济调整的成效显现,1981年下半年,国际上的疑惑基本消除了,舆论逐渐转向积极方面。6月,世界银行发布的关于中国经济情况的报告,对中国经济表示乐观,认为中国现时的经济路线是正确的^⑤。7月,《日本经济新闻》指出,中国经济已经开始稳步上升了,“从今年春天开始,这些注视着经济调整的外国势力的目光变得温和了”,“对华悲观论不久就要消除了”^⑥。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召开前后,外电纷纷评论:中国经济调整已取得成就,财政赤字减少,工农业生产总值将比去年增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稳步发展的轨道,全国人民对搞好经济建设有很大信心^⑦。首先,财政收支趋于平衡,中国“大大减少了财政赤字,这在国际上也是罕见的”^⑧。其次,信贷收支有所改善,中国贸易收支迅速好转,“对于这几年一直苦于外汇不足的中国来说,可以说是盼望已久地转亏为盈”^⑨。再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国家压缩重工业以促进消费的新政策已开始使它的十亿人民受益了”,“通货膨胀已经缓和”,“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持续上升”^⑩。其四,在经济结构方面,轻工业得到了发展,但是“重工业的产量下降,影响了轻工业的增长速度,因此政府正在采取措施恢复轻重工业之间的平衡”^⑪,“重新回到重工业上去对于许多外国公司来说可能是好消息”^⑫。

经济发展回到正确的航向,使国际上对中国对外开放的前景恢复了信心。《美国商业》杂志指出,中国“已经在大步朝着使自己成为国际商业社会的一个正式成员的方向前进了”,“在过去的三年内已经使它同西方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已经开始用西方的信贷资助进口,同时还积极鼓励同西方公司搞合资经营”,尽管中国的调整政策很有可能继续执行,但贸易和投资的未来

① 《国外舆论谈中国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1期。

② “China Clarifies Trade Policy”. *The New York Times*, 27 Jan 1981, p. D12.

③ 罗元铮:《一次富有成果的关于世界经济问题的国际学术讨论会》,《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第2~6页。

④ 温伯友:《一次成功的讨论会——杭州国际世界经济讨论会侧记》,《经济研究参考资料》1981年第118期,第25页。

⑤ 《香港〈明报〉》评:世界银行发表的关于中国经济情况报告,《参考消息》1981年8月28日,第1版。

⑥ 「外にはほほ笑む中国经济——資金導入パイプ作り(世界の潮流)」,『日本経済新聞』1981年7月20日朝刊、5頁。

⑦ 《各方舆论对中国五届人大四次会议的评论综述》,《参考消息》1981年12月11日,第1版。

⑧ 《日本〈每日新闻〉驻北京记者发表评论说:赵紫阳报告基调是高度赞扬经济调整成果》,《参考消息》1981年12月5日,第1版。

⑨ 「中国の貿易収支、急速に好転——4年ぶりに黒字も、輸入抑制策ようやく浸透」,『日本経済新聞』1981年10月24日朝刊、5頁。

⑩ 《〈亚洲华尔街日报〉说: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持续上升》,《参考消息》1981年10月16日,第2版。

⑪ 《英〈每日电讯报〉说:中国的经济正在好转》,《参考消息》1981年11月3日,第2版。

⑫ 《秦家骢撰文〈中国重新强调重工业〉》,《参考消息》1981年10月18日,第2版。

仍是光明的。^①美国《亚洲邮报》也认为,虽然中国的现代化计划几经调整,但是计划中规定的政策方针没有变,中国同世界其他各国的经济关系仍在继续发展,中国现代化前景是良好的^②。日本《国际贸易》指出,中国将由“以自我为中心”变为“以国际经济为中心”,这种改变势在必行^③。国际上还对经济调整的意义作出了积极评价,承认经济调整是坚持实事求是原则的体现。外媒指出,经济工作永远是一个调整的过程,有一个大致的纲要之后,必须根据不断变动的情况而经常修订,不断改革不合理的制度和工作方式,这一经济调整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实事求是”精神的实践^④。

国际舆论对中国经济调整评价的转向,不仅表现为态度上由“消极”到“积极”的过渡,更涉及心理预期、价值观念和行动逻辑的深层转变。

首先,从盲目乐观到理智冷静。在对外开放的起步阶段,由于中国急于恢复发展经济和外国急于抢占中国市场的双重作用力,中外在经济合作中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正如《华盛顿邮报》所指出的:“双方的期望都太高了。”^⑤1979至1981年的两次经济调整,虽然在短时期内掀起了国际舆论热潮,但从长远看起到了方向纠偏的作用,为对外开放奠定了更为坚实和健康的基础。美国《铁时代》杂志的一篇文章对这一过程作出了较为生动的概括。文章认为,外国向中国的“求爱”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迷恋中国不断增加的进口商品;第二阶段,由于中国把注意力特别转向外国而心情激动;第三阶段,在中国退下来重新估计它的前进做法时感到幻想破灭。随着中国对经济工作的重新估计,外国对中国的态度进入了第四阶段,即在理智客观的研究基础上再度开展合作。“这种情况意味着中国市场看来再度是使人乐观的。中国人看起来首先向前猛冲一阵,然后退下来进行重新估计,现在似乎又重新向前迈进,但是步伐略有不同,稍微放慢了一点”^⑥。经过试错,中国对外开放步伐更加稳健,国际舆论和预期也更符合实际。

其次,从存在疑虑到达成信任。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中国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相对封闭,这使得中外双方在合作中都要经历一个心态调试期。日本媒体认为,经济调整时中日双方出现的误解,很大程度是由于缺乏了解和信任导致的:尽管中国和日本是邻邦,但“我们不太了解中国的情况,中国对日本的情况也不大清楚”,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双方正在一步一步加深彼此的认识,但“还没有成为推心置腹地商谈的关系”,“发生种种误解和隔阂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⑦。科威特媒体指出:“尽管西方人士蜂拥至中国这个场所,但是对中国的局势仍感不放心。中国的一切事情的进程以及它同西方的关系被各种矛盾笼罩着,使人们很难对今后事态的发展作出确切的估价”^⑧。信息匮乏是导致西方不信任的重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政治消息和经济数据都是严格保密的,西方只能通过“把新华社发表的零碎消息拼凑起来”猜测中国的政策动向^⑨。经济调整政策实施后,“中国政府采取了新的开诚布公的态度”^⑩。1979年,中国公布了国防预算、外援规模以及总人口等经济数据。一些外交官表示,中国终于脱离了不公布经

① 《〈美国商业〉杂志载文说:中国的调整政策为它的经济奠定坚实基础》,《参考消息》1981年10月22日,第2版。

② 《美〈亚洲邮报〉文章:〈华盛顿:美中经济关系发展〉》,《参考消息》1981年11月8日,第2版。

③ 《日伊藤万股份公司总经理河村说:中国在扎扎实实地实施现代化计划》,《参考消息》1982年2月20日,第2版。

④ 《香港〈明报〉发表社评说:中国经济建设蓝图越来越现实》,《参考消息》1982年2月28日,第2版。

⑤ Hobart Rowen. "China Bites Bullet, Sees Past Errors In Planning Its Economy: China Looking Again at Economic Growth Potential". *The Washington Post*, 22 Feb 1981, p. G1-G8.

⑥ 《美刊文章〈经过一短暂停顿后中国重新行动起来〉》,《参考消息》1979年7月7日,第4版。

⑦ 《日〈时事解说〉短评〈冷下来的中国热〉》,《参考消息》1979年4月28日,第1版。

⑧ 《科威特〈舆论报〉评论:〈中国的经济开放没有消极面吗?〉》,《参考消息》1979年1月29日,第4版。

⑨ 《美报评论:〈中国公布了它的经济生活的真相〉》,《参考消息》1979年7月30日,第4版。

⑩ 《英〈金融时报〉社论〈中国的调整〉》,《参考消息》1980年12月9日,第2版。

济情况的时代,结束了持续二十年的保密的传统,向全世界公布了它的重要的经济统计数字^①。可靠的信息获取渠道消除了很多误解和猜忌。中国在经济结构方面表现出的坦率态度“使全世界大大增加对中国的了解”^②,这为中外双方在合作中构建信任和达成共识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其三,从默认西方发展模式为标杆到认同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改革开放之初,许多西方报纸把中国描绘成在快步走向资本主义,或在照搬南斯拉夫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还有西方人士提出疑惑:“中国的经济改革,从长远的发展前景看,是不是会出现非共产主义政府?中国是不是准备按资本主义的模式搞现代化?”^③面对经济中出现的问题,中国采取了一定调整措施,虽然暂缓了对外开放的步伐,但也凸显出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模式的必要性。1979年3月,邓小平在会见英中文化协会执委会代表团时表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可能比想象的还要困难些,并首次运用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这一说法。两天后,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问题和实施三年经济调整进行说明,正式提出了“中国式的现代化”的命题^④。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表达也使国际社会认识到,中国不模仿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是要走自己的路。日本共同社指出,中国正在迅速地提醒人们注意本国的“独特性”,“关键的一条就是要从本国的实际出发,立足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⑤。日本媒体反思了“大引进”时忽视中国国情的行为,指出“天下没有一种‘现代化的楷模’能够一律适应辽阔的中国大陆”,不同于西方式或者日本式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大概只能通过中国式的想法和实践去实现”。中国向日本学习并不意味着模仿照抄日本的成就,“把一些庞大的设备随意送去”,只会断送了中国现代化的前途^⑥。美国斯坦福国际咨询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室主任梅尔文·小厄尔认为,“中国人一面要吸取工业国的经验,同时在努力发展一种独特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观点”,这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发展模式。^⑦美国《美洲华侨日报》也说,中国开始注意到了社会方向的问题,“要有选择地吸取他国的经验,而且是多方面的经验,不能象某些发展中国家一样,只单纯地学美仿日,始终闯不出自己的一条路子出来”^⑧。在磨合和试错中,国内外对于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逐步凝聚了共识、构建了认同。

结 语

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国急于恢复发展“文革”时期破坏的国民经济,以及西方发达国家亟需拓展中国市场,中外双方在经济合作中都出现了急躁冒进的情绪。中国实施调整政策后,国际上反应十分剧烈,掀起了两波关于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的国际舆论热潮。中共认真聆听、回应和引导国际声音,加强对外宣传工作的针对性,不断用实际行动形塑国际舆论,有效促成舆论评价转向积极。1979年初至1982年末,国际上对中国经济调整问题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从盲目乐观,到理智冷静;从存在质疑,到逐渐认可;从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标杆,到认可中国式的现代

① Mathews Linda. “China Bares Its Economic Facts of Life: China Reveals Economic Facts”. *Los Angeles Times*, 23 July 1979, p. 1.

② 《中国人突然变得易为人所了解》,《参考消息》1979年7月9日,第1版。

③ 《外国经济界人士怎样看中国现代化和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2期。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卷,第496至497页。

⑤ 《号召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参考消息》1979年4月18日,第1版。

⑥ 《日报述评〈中国现代化与西方化不相干〉》,《参考消息》1979年4月6日,第4版。

⑦ 《外国经济界人士怎样看中国现代化和经济调整》,《对外报道参考》1981年第2期。

⑧ 《〈美洲华侨日报〉文章:〈多方吸取建设经验〉》,《参考消息》1981年7月11日,第2版。

化模式的变化历程。国际舆论的发展演变表明,中国以开放的姿态融入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是中外双方不断消除误解,解除怀疑,达成共识,塑造信任,减少盲目预期和构建理性认知的磨合和试错历程。在这一动态互动过程中,中国也在不断深化对自身现代化道路特殊性的认识,从而酝酿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话语表达。正如共同社所说:“在研讨因一九七七年和七八年偏重重工业路线而发生的工农业不平衡的基础上,重新制订经济政策,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步”^①。

(本文作者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北京 100871;

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雅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北京 100871)

[责任编辑:凌承纬]

《党的文献》2023年第6期要目

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3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23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习近平
永远铭记一代伟人的伟大历史功勋	欧阳淞
毛泽东与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探索、开辟和拓展	陈晋
毛泽东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贡献	张树军
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贾高建
试论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	张海鹏
毛泽东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贡献	吴德刚
魅力四射 辉煌久久	
——毛泽东诗词魅力赏析	高俊良
毛泽东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战略谋划及启示	刘光明
毛泽东在伟大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战略指导	毛新宇
在国际风云变幻中把握历史主动	
——毛泽东实践道路的当代启示	张宏志
试论毛泽东的历史自信	陈金龙
毛泽东对思想政治工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	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体系若干核心议题研究现状分析	康晓强 肖振南
“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深入学习习近平关于人口工作重要论述	田天亮
建党前夕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相结合的历史考察	葛世林
新中国成立初期东北地区国营企业的管理民主化工作	苗庆科 荆蕙兰

^① 《共同社电讯:〈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述评〉》,《参考消息》1979年6月20日,第1版。